

一九五〇年代經濟史的再思考： 評《商人、企業與外資》

夏傳位

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

《商人、企業與外資：戰後台灣經濟史考察（1945-1960）》，洪紹洋著，台北：左岸文化，2021年12月，208頁。

近幾年，不論從學界到大眾媒體，台灣1950年代歷史在各方面都掀起重新檢視和關注的風潮，從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故事不斷出土，情治監控檔案曝光所引發的轉型正義討論，不當黨產的清查與索討，國際冷戰局勢互動如何形塑國民黨政權的命運，到台灣經濟奇蹟究竟如何發生及為何可能等等，在在刷新人們既有的認知。這些討論的共同特色在於，大量運用過去不為人知的檔案和史料來提出假設與建構論證，並挑戰過去的泛泛之論和理所當然的判斷。

由於發展型國家論在過去解釋台灣經濟上位居主導地位，同時該模式相對較忽視1950年代早期的歷史，近來以歷史取徑對日治後期與1950年代台灣經濟史的細緻爬梳和重新詮釋，無可避免地也是重估發展型國家論效力，有些重新印證該模式的有效性，如瞿宛文（2017）；有些（主要是台灣史學界）則專注於特定史實的發現與討論，然而發展型國家論仍然是潛在指涉並批判的對象。新研究仍然分裂成支持與質疑發展型國家論的兩大陣營；但有趣的是，兩造的辯論往往僅發生在史實層次，卻沒有針對發展型國家論本身做出新檢討。從此角度看，這波新研究雖然運用大量史料，但革命性的新論述仍有待發掘。

戰後台灣本地資本從何而來

洪紹洋是史學界深耕 1950 年代經濟史的中堅人物，新書《商人、企業與外資》也是該領域的力作。這本書重新提問一個過去已有標準答案的經典問題，並給出了不一樣的答案：戰後台灣第一代的民營大企業是如何崛起的？其壯大的路徑為何？傳統觀點如涂照彥（1991）與劉進慶（1992）認為，日治時期台灣的經濟角色被侷限在農業，食品加工占工業產值的絕大部分，至於工業化是從 1931 年日本開始推行南向政策之後才啟動，是一種完全配合軍國主義目標的「軍需工業化」，既不以台灣自身經濟需要為本，到後期因應戰事所需更逐漸被日本政府強制整編與合併，本地資本被趕出工業領域。因此，戰前日治時期的工業化是一種沒有擴散效應、無法延續的「殖民地飛地經濟」。台灣戰後第一批本地資本家是純粹戰後的新產物，要到國府推動土地改革實施「耕者有其田」，將水泥、紙業、工礦、農林四大公司民營化，「以舊地主階層為中心的本地資本繼承了日人中小資本」，才是「本地資本的崛起」（劉進慶 1992: 80, 85）。

上述說法將戰前、戰後視為兩個斷裂而不同的時期，民營部門工業化只有在戰後才大幅發展。洪紹洋藉由將眼光投向 1945-49 年間改朝換代的轉換期——由於歷史分期的預設，這段時期過去很少受檢視——挑戰並修正這樣的說法。他發現戰後崛起的第一代本地大資本家，在這段轉換期中大多是外向型的中小商業資本，從台灣對外貿易重心轉換的過程中，在台一日、台一中貿易之間尋找機會，他們的資本積累比起彼時以島內民生市場為對象的中小製造業（在這段時期亦出現了一波創業潮）要來得容易且快速許多，因為在當時惡性通貨膨脹的背景下，製造業面臨原物料和工資大幅上漲的壓力，持有實物的商業資本則比較不受影響。

除了時局賦予資本積累的優勢外，洪紹洋還強調這些資本家與日本企業在戰前所建立的關係，對於戰後轉向工業經營的幫助，他們通常是從商品代理開始，逐漸跨足製造。例如：創辦和泰商行的黃烈火，戰前從事油品買賣，並取得橫濱輪胎與豐田汽車的代理，戰後創

辦了南港輪胎，接著成立國瑞汽車投入汽車製造。台南幫吳修齊、吳尊賢兄弟是從新和興布行起家，從日本批入棉布在台銷售，戰後則投入紡織事業。新光集團創辦人吳火獅亦是從進口布匹、雜貨、紡織零件起家，戰後創辦新光紡織廠，投入人造纖維和染整業。在這過程中，與日本企業的關係發揮重要影響，除了延續產業經驗和管理知識之外，尤其是在技術引進和指導上，有些日本企業後來甚至以技術或資金入股的方式深化合作關係，如後來以「國際牌」聞名的國際通信機械公司與日本松下電器之間的關係；或是大同公司與東京芝浦電氣株式會社的關係。日資在戰後持續透過戰前商業人脈進入台灣，例如第一物產最初將辦公室設在何義經營的永豐股份有限公司辦公室內，因為永豐商店在戰前即是第一物產的母公司三井物產經銷化學肥料的代理商。

技術與人脈網絡的淵源

企業技術如何取得，亦是本書考察的重點。過去發展型國家論強調政府工業投資計畫扶助的角色，洪紹洋則另闢蹊徑，探討 1950 年代美、日外資在技術轉移中的作用，此亦為過去鮮少有人碰觸的題目。他以經合會檔案《華僑及外國人來台投資與技術合作、工業服務》中的〈外國人投資簡表〉，以及《美援運用成果檢討叢書之二：美援貸款概況》為指引，系統地整理接受美、日外資技術轉移的廠家和合作技術項目，粗略而言，有機電、化學、食品、礦業和營造等五大類。

這些案例呈現的圖像補充了發展型國家論。一方面，不少案例接受美援計畫貸款，政府或要求引進最新技術以提升產品品質，或予以進口保護而扶植（如日光燈和味精），這符合發展型國家論的原有論點；但另一方面，本書亦凸顯台、日企業間人際網絡和半官方組織所發揮的牽線作用。在當時引進的 10 件日本技術中，有 4 件是由當時日本首屈一指的電器生產商東京芝浦電氣株式會社所提供，包含燈泡、日光燈、電錶等技術。該社社長石坂泰三身兼日本經濟團體聯合

會會長，積極率領日本商界赴海外拓展商機，俟 1957 年中日合作策進會成立，即透過該組織與台灣政商間建立聯繫。中日合作促進會在引進日資、促進技轉方面有更廣泛的作用（洪紹洋 2012）。

至於傳統觀點中對「本地資本崛起」至關重要的四大公司民營化，作者集中鑽研過去未曾細緻檢視的台灣工礦公司分廠出售過程，亦有一些獨特發現。首先，工礦公司的民股董事名單中，除了傳統觀點強調的五大家族土地資本外，有相當比例是中小與新興工商資本，包括後來成為大集團企業的永豐餘何家、新光吳家、士林電機等，顯示四大公司民營化不僅是土地資本轉向工業的契機，新興工商資本也利用機會進入新產業、擴展規模或進行多角化經營。其次，在 11 間磚廠出售的部分，顯現地方派系、民意代表與營建業的高度參與，拓展了過去對於戰後地方資本集中在信用合作社與農漁會系統的認識。

順著 1950 年代美、日外資的技術轉移，作者討論了日本工業資本來台的直接投資、政府主導的對日經濟合作、美台之間的技術人才網絡和商貿網絡，以及美、日資本進入的特殊軍事市場等。過去對於這些美、日資本投入部門的認知，多侷限於 1960 年代之後投入內需市場或外銷為主的新興民生工業。然而，在 1950 年代實施複式匯率與嚴格限制外資匯出利潤下，外資多以提供技術的方式賺取權利金，在極少數的直接投資案例中，政府主導色彩鮮明，且並非出於純粹經濟發展考量，而是同時夾帶軍事、兩岸競爭、經濟安全等多重考慮。例如在台灣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的經濟合作提案中，帶有「拉攏日方、壯大我方，並與對岸競爭」的謀略，洪紹洋稱之為「深具反共色彩的外資引進政策」；另外，政府核准日本關西油漆株式會社與唐榮鐵工廠合資設立唐榮油漆公司一案中，是以軍事目的為主導，意在滿足海軍艦艇所需的高級塗料，並替代原先由美援提供的進口品以節省外匯。

「節省外匯」的理由在許多進口替代投資案中都可見到，包括書中討論以駐台美軍市場為起點的福樂奶品公司、中國人造纖維公司，後者的創辦構想是由尹仲容主動提出，帶有軍事色彩：尹氏擔憂

在棉花多仰賴進口的情況下，一旦遭遇戰事將出現供應困難，勢必造成嚴重「衣慌」。甚至發展型國家論的經典教案台塑公司的設立，最初也是為了節省進口聚氯乙烯（PVC）的外匯。本書對於上述案例的詳細歷史敘事，點出了一個重要提醒：1950年代有其特殊時空背景，很多事後詮釋為「發展經濟」的官員決策，實際上當時可能另有考量。巫永平（2017: 43）即論證，在1950年代外匯嚴重短缺、維持國際收支平衡困難的背景下，許多政策動機與其說是經濟發展，不如說是為了經濟穩定和生存；另外，軍事考量與經濟的關聯也不容忽略（Nordhaug 1998）。

超越國家中心 vs. 社會中心

如同本文一開始所言，這本書的定位與價值應該置於台灣史學界近年來對於日治末期和1950年代經濟史重新檢視的風潮中。以「戰前、戰後台灣經濟延續性」命題為核心，已經累積相當多的專書和文章，舉其重要者有薛化元（2012）主編並主持翻譯的日本新銳學者論文集、高淑媛（2012, 2016）、謝國興（2013）等等，這一系列研究的特點在於重新檢討日治末期的工業化性質，並將台灣戰後中小企業的根源追溯到戰前以台灣人為主體的中小零細工業之自主發展，這是來自日本治下的工業化雖具有殖民特徵，卻因為商品經濟發達、都市化發展、電動力引入、工業教育擴大，加上台灣農家經營極具韌性與擴張力的社會文化特質，仍帶來近代化的擴散結果（請見林文凱[2017]極具參考價值的系統性回顧文章）。

本書雖將研究視角轉換至戰後第一代民營大企業的崛起，但與上述研究群仍有共同特徵，即在上層政治軍事的殖民統治和大型資本壟斷的結構底下，尋找底層以台灣人為主體的社會經濟之延續性和漸進演變；其創新的根源也類似，即透過挑戰武斷的歷史分期，從原本區分的範疇看到混雜延續的可能性，從而獲得新視野和新觀點。

然而，持對立觀點，主張戰前日本遺產對戰後台灣工業化並無貢獻的瞿宛文（2017），其切入1950年代經濟史的翻案手法，亦是從

歷史延續性中得到靈感，只不過關注的延續性是 1930 年代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成立的「國家資源委員會」，它創設了以工業救國的經建體制，包括意識形態、人才培育、組織制度，以及最重要的，出於救亡圖存急迫感的「發展意志」，成為台灣戰後發展型國家的原型。此一命題最初是由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所長柯偉林（William C. Kirby）所提出（Kirby 1984）。

台灣史學界指出瞿宛文觀點在歷史事實上的「錯誤」，例如宣稱戰後初期的本省籍企業家在戰前沒有製造業的生產與經營經驗，1930 年代的工業教育沒有培養台灣人才等等（林文凱 2017: 140；高淑媛 2016: 135-156；謝國興 2017）。這些批評固然有理，卻未完全解決爭議，因為分歧不完全是史實的問題，更多是由觀點決定的史料取捨和詮釋問題。此外，正因為採取國家中心的視角，決定了研究者選擇並解讀史料的判準不是底層技術、人脈網絡和社會文化特質的延續性，而是大規模工業化的條件和起始點，這必然會回過頭來肯定戰後國府經建官員的民族主義心性和政策傳統之解釋力。

易言之，對話和辯論並沒有發生。更好的挑戰方式應該是以「社會中心」和「國家中心」觀點直接針對 1950 年代國家的經濟角色交鋒。台灣戰後經濟史是 1949 年之前的中華民國史與 1945 年之前日本殖民統治史的匯合，而呈現一個 Y 字型軸線（劉維開 2017）。近年來 1950 年代台灣經濟史的熱鬧活力，正是兩派各自以 Y 字型的一邊向前延伸得到的成果。那麼，更深刻的研究問題將不是歷時性，而是共時性：來自異質時空的歷史斷片如何匯聚（conjuncture）在 1950 年代的局勢之下而彼此互動影響？

更重要的是從具體歷史脈絡和「國家生存」的寬廣視角來詮釋國家的經濟政策，這也是 Chalmers Johnson（1982）出版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的原意。¹

1 Johnson 的著作原本是一個歷史個案研究，比較側重了解「什麼樣的環境以及世界觀促使日本人形塑出獨特的制度，最後並創造知名的產業政策」，而不是「什麼樣的經濟邏輯解釋日本產業政策獲致那麼大的成功」（Woo-Cumings 1999: 2）。

遵循此一探究歷史獨特性的精神，一條研究進路是從戰後國家形成的歷史起始條件差異，系統性地比較並解釋台、韓之間不同「發展型國家」的路徑，代表作有鄭敦仁（Cheng 1990）、巫永平（2017）。他們認為國民黨作為「外來政權」的性質，深刻影響了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及經濟戰略，並與南韓政府形成一系列對比，例如：實施普惠而非特惠性的鼓勵出口政策，使用租稅獎勵而非選擇性信貸，對民營大企業既扶植又限制往上游產業擴張（如台塑），對中小企業則是不扶植也不限制（至少在 1970 年代之前），形塑了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獨特產業結構。這條「政治解釋」進路應該對當前的焦點話題有不小的參考價值。對國家中心觀點可以追問：根據國民黨政權的特質，經濟官員以中國民族主義作為發展動力，其效力會跟日本、韓國的民族主義一樣嗎？它的號召力僅侷限於黨國系統，還是能得到廣泛社會階層的共鳴？²對社會中心觀點可以追問：如果台灣社會本身的社會文化特質和殖民遺產是理解本地企業興盛不可或缺的要素，那麼國家的政策與作為又如何促進或限制這些因素？

另一個推敲的途徑是從「集體行動的協調」入手（Doner 1992; Noble 1998），畢竟民族主義對經濟的功效，在於我們假定它能促使上下一心、跨越集體行動的協調障礙，以專心致志發展經濟。中小企業的「分散式生產體系」要深化技術與產業升級，特別會面臨集體行動的協調問題；而國家在促進網絡的協調與跨產業學習，防止「網絡失靈」上可以扮演重要角色。思考此一問題並不是重彈「國家自主性」的老調，而是關注「超越發展國家 vs. 網絡的迷思」（謝斐宇 2019），以探究多方行動者協作的機制。

本書第三章以一個湮沒在史堆中的案例觸及上述關鍵問題。縫紉機需要大量零件，過去認為國家以自製率為交換條件，同意美商勝家公司在台灣投資設廠，此一決策促使技術擴散並扶植本土零件供應體系（Gold 1986），這是一個典型的發展型國家解釋。透過本書可以

2 徐進鈺（2017）也提出了此一質疑，儘管導向不同結論。

得知，在勝家之前，本地資本家張深耕 1941 年即在台中州大雅庄創辦台灣裁縫機製作工廠，演進至 1960 年代後期，在台中、彰化地區已經形成零件供應的衛星工廠體系，同時也生產自行車和汽車零件。

有趣的是，1940 年代後期，台灣省針車公會推動「樣板制度」和「公差制度」，推動各工廠所生產之零件標準化，此乃提升品質的關鍵，可惜後來失敗。這個案例透露，民間「分散式生產體系」的創立與國家作為無關，業者其實早就意識到解決集體行動協調困境之重要，³反而是國家的認識與作為相對晚很多（卻仍然很重要）。根據謝斐宇（2019）的研究，至少要等到 1970 年代以後，國家才開始有意識地創建相關協調機制，在標準化、驗證與品管等共同問題上下功夫，以促進並維護此一網絡體系。

以上是對 1950 年代台灣經濟史知識狀況及其相關議題的簡要勾繪。從這個角度來看，洪紹洋新作頗有參考價值。本書的貢獻首先在於對台灣戰後第一代本地大企業之崛起，提供了創新而有價值的說法；其次是從社會中心的角度挖掘出許多被掩蓋或忽略的歷史材料和個案，豐富了我們對於這段時期的認知；最後，書中飽滿且充滿細節的敘事，是提出進一步研究問題和理論化的沃土。

參考文獻

- 巫永平，2017，《誰創造的經濟奇跡？》。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
- 林文凱，2017，〈晚近日治時期台灣工業史研究的進展：從帝國主義論到殖民近代化論的轉變〉。《台灣文獻》68(4): 118-146。
- 涂照彥，1991，《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李明峻譯。台北：人間。
- 洪紹洋，2012，〈中日合作策進會對台灣經建計畫之促進與發展（1957-1972）〉。《台灣文獻》63(3): 91-124。
- 徐進鈺，2017，〈把民族找進發展型國家理論：評瞿宛文〉。《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7: 205-212。

3 另一個例子是台灣鞋業。業者解決集體協調問題的方式是透過產業公會訂定「協定出口價格」和「有秩序市場行銷協定」，其中國家的角色是被動的。這是台灣鞋業避開美國貿易保護，成為世界第一的關鍵，參見鄭志鵬（2011）。

- 高淑媛，2012，《台灣近代化學工業史（1860-1950）：技術與經驗的社會累積》。台北：台灣化學工程學會。
- ，2016，《台灣工業史》。台北：五南。
- 劉進慶，1992，《台灣戰後經濟分析》，王宏仁、林繼文、李明俊譯。台北：人間。
- 劉維開，2017，〈舊瓶新酒：戰後台灣經濟研究的新取徑〉。《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7: 199-204。
- 鄭志鵬，2011，〈攘外必先安內：產業公會與台灣鞋業治理結構形成的歷史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3(1): 15-60。
- 薛化元主編，2012，《發展與帝國邊陲：日治台灣經濟史研究文集》。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謝國興，2013，〈戰後初期台灣中小企業的殖民地傳承〉。頁 45-85，收入謝國興編，《邊區歷史與主體性形塑：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 ，2017，〈戰後台灣經濟發展源起的兩個小敘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7: 219-225。
- 謝斐宇，2019，〈超越（發展）國家 vs. 網絡的迷思：重探現代經濟的替代發展途徑〉。頁 365-393，收入湯志傑主編，《交互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從台灣出發的反省》。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瞿宛文，2017，《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台北：聯經。
- Cheng, Tun-Jen. 1990. "Political Regim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outh Korea and Taiwan." Pp. 139-178 in *Manufacturing Miracles: Path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edited by Gary Gereffi and Donald L. Wym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oner, Richard F. 1992. "Limits of State Strength: Toward an Institutionalist View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ld Politics* 44(3): 398-431.
- Gold, Thomas B. 1986.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Armonk, NY: M. E. Sharpe.
- Johnson, Chalmers.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rby, William C. 1984.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ble, Gregory W. 1998. *Collective Action in East Asia: How Ruling Parties Shape*

- Industrial Poli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Nordhaug, Kristen. 1998. "Development through Want of Security: The Case of Taiwan." *Forum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25(1): 129-161.
- Woo-Cumings, Meredith. 1999. "Introduction: Chalmers Johnson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Pp. 1-31 in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edited by Meredith Woo-Cuming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